

西夏文《六祖坛经》与汉文本渊源关系新考*

刘少华 孙祎达

内容摘要:自从胡适指出《六祖坛经》的早期版本与通行本存在巨大差异以来,其版本流变问题成为《六祖坛经》研究,乃至早期禅宗史研究的焦点之一。在学界的长期努力下,共发现五种敦煌本、五种惠昕本等早期版本,以及诸多后世版本。然而,在各早期版本得到反复讨论的同时,《六祖坛经》的西夏文译本,尽管问世很早,却未受到充分重视。目前发现有两种西夏文《六祖坛经》,其中散藏于各地的草书译本属于敦煌本,具体而言处于旅博本所代表的敦煌本到惠昕本的过渡阶段,其出土地在敦煌的可能性极大;黑水城出土的楷书译本并非学界此前认为的敦煌本,而是曾在国内流传的、仅见的惠昕本。两种西夏文《六祖坛经》不仅是探讨西夏佛教的珍贵材料,也对《六祖坛经》汉文本的版本流变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六祖坛经》 西夏学 敦煌学 胡适

引言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胡适利用新见的《六祖坛经》早期版本,提出通行本经过后代大量改易。尽管他在此基础上得出的一些惊人结论在今日看来略显粗疏^①,但有关问题涉及到《六祖坛经》的文本基础与早期禅

* 本文系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从西夏文《灯要》看辽代佛教的传播与影响”(L23CMZ001)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高希中:《胡适〈坛经〉考证方法论再审视》,《殷都学刊》2020年第4期,第66—74页。

宗史的关键,因此引发学界持久的探索^①。在世界各地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已发现《六祖坛经》版本有三大系统共三十多种,其中胡适认为是“最古本”的敦煌唐写本系统^②,原题《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共有五种,现分藏中、英两地(以下简称“敦煌本”)。“人间第二最古”的北宋初年惠昕整理本系统^③,原题《韶州曹溪山六祖师坛经》或《六祖坛经》,目前在日本保留有五种(以下简称“惠昕本”)。此外还有众多源自宋仁宗至和年间僧人契嵩的改编本系统(包括通行的元代僧人宗宝的改编本系统)^④。可以说,每个版本,尤其是早期版本的发现,都会为研究的推进带来新契机。

在学界聚焦敦煌本《六祖坛经》的同时,西夏文译本《六祖坛经》也悄然问世。《六祖坛经》这部东亚佛教的核心典籍之一,先前被认为仅以汉文流传,而西夏文译本的出现无疑打破了这个固有认知;并且,西夏时期正处于《六祖坛经》文本嬗变的关键时期,其价值不言而喻。20世纪30年代,罗福成、川上天山已据所见残页进行初步翻译^⑤,不过此后很长时间内学界都未再关注,直到20世纪末以来,史金波、索罗宁(K. J. Solonin)、王志勇等人才对新见材料进行了解读。史金波注意到,“西夏文本和法海本相近而不雷同,疑西夏译本所据汉文底本为现已失传的另一版本”^⑥。

①葛兆光指出,禅宗史研究仍需要“在胡适的延长线上继续开拓”(葛兆光:《仍在胡适的延长线上——有关中古禅史研究之反思》,《再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10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36—38页)。

②胡适:《〈坛经〉考之一:跋〈曹溪大师别传〉》,《国立武汉大学文哲集刊》1930年第1期,第33—43页。胡适:《自序》,《胡适校敦煌唐写本〈神会和尚遗集〉》,亚东图书馆,1930年,第1—5页。

③胡适:《记北宋本的六祖坛经(跋日本京都堀川兴圣寺藏北宋惠昕本〈坛经〉影印本)》,《文史丛刊》1934年第1期,第1—21页。

④杨曾文校写:《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314页。白光:《〈坛经〉版本谱系及其思想流变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2—3页。

⑤罗福成:《〈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残本释文》,《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0年第4卷第3号,第227—235页。[日]川上天山:《西夏語譯六祖壇經について》,《支那仏教史學》1938年第2卷第3号,第61—66页。

⑥史金波:《西夏文〈六祖坛经〉残页译释》,《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3期,第91页。

索罗宁指出这些歧义未必仅因翻译所致^①。文志勇考察英藏本与此前西夏文本都不相同,也与宗宝本不同,他推测为敦煌本的简写^②。由于这些研究侧重于翻译,未就其版本问题与存世汉文本做细致的比较,因此很难被关心《六祖坛经》版本的学者利用^③,有关问题尚待更进一步的讨论。

一、西夏文译本《六祖坛经》的来源

西夏文《六祖坛经》,目前可见两种,其一为楷书写本残页(以下简称“楷书本”)。为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队所获,现藏大英图书馆,编号 Or. 12380-3870(K. K.)、Or. 12380-3870V(K. K.)。已公布于《英藏黑水城文献》^④,不过顺序拼接有误^⑤。

其二为草书写本残页(以下简称“草书本”),写在西夏文草书《瓜州审案记录》之背面。分别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B11·002(84192V)2页;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B31·002(63.542V)1页;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B21.004(X1-1[01639]V)、B21.005(X1-2[01639]V)、B21.006(622573[419.510.10a]V)3页;日本龙谷大学大宫图书馆 02-021叶;上虞罗氏藏3页;傅斯年图书馆藏1纸及4残片(49号B)^⑥。史金波曾“从纸张、笔迹等形

①K. J. Solonin: “The Fragments of the Tangut Translation of the Platform Sutra of the Sixth Patriarch Preserved in the Fu Ssu-nien Library, Academia Sinica”,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九本第一分,2008年,第163—185页。

②文志勇:《英藏黑水城出土文献西夏文〈坛经〉释考》,《西夏研究》2021年第2期,第3—8页。

③对西夏文本的利用,参见曾晓红执笔,研读班集体讨论,方广钊修改审定:《敦煌本〈坛经〉校释疏义第八章》,《藏外佛教文献》第二编总第十二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06—408页。

④西北第二民族学院、上海古籍出版社、英国国家图书馆编:《英藏黑水城文献》第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00页。

⑤文志勇:《英藏黑水城出土文献西夏文〈坛经〉释考》,《西夏研究》2021年第2期,第3—8页。

⑥来源分别参见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册,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8页;《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2册,第354—356、363页;武宇林、[日]荒川慎太郎主编:《日本藏西夏文献》上册,中华书局,2011年,第221页;罗福成:《〈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残本释文》,《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0年第4卷第3号,第227—235页; <https://lib.ihp.sinica.edu.tw/03-rare/dunhuang/metadatahtml/188119.htm> (访问日期:2023年10月15日)。

态看”,认为考察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所藏《六祖坛经》残页,与罗氏之前公布的属于同一写本^①,索罗宁认为傅图所藏残页也属于同一写本^②。总之,这些分属不同机构的残页,从字体、每行字数、纸张、内容,以及另一面的文字与官印来看,均属同伴文献。

根据英藏楷书本有编号 K. K. (Khara-Khoto),可知其出土地为今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水城,此地曾出土大量西夏、蒙元等时代的文献。但草书本西夏文《六祖坛经》的来源却没有直接线索,在近代出土的西夏文献中,它的流散情况最为复杂,现分藏于 6 个单位,出土地主要有黑水城、敦煌、灵武、吐鲁番等不同说法,对此考察较为全面的是王惠民,他厘清前人不少误区,但仍坦承“发现地点并不清楚”^③。

罗振玉是近代著名的收藏家,亦是中国西夏研究的先驱,罗家所藏由其子罗福成公布。罗振玉对研究资料多会记述来历,然而罗福成却并没有提及《六祖坛经》^④。今存有关罗家藏书资料,亦未见其踪迹,原件下落不明。

日本龙谷大学所藏《六祖坛经》为橘瑞超藏品,馆藏目录标为“出土地不明”^⑤。考察当时一同参与发掘的野村荣三郎的日记及其整理的目录^⑥可知,有三件发掘自吐鲁番吐峪沟的西夏文经片,即为西田龙雄所指出的“西夏文不明论典”^⑦,并非《六祖坛经》。不过,罗福苾在 1914 年提

①史金波:《西夏文〈六祖坛经〉残页译释》,《世界宗教研究》1993 年第 3 期,第 90—99 页。

②K. J. Solonin: “The Fragments of the Tangut Translation of the Platform Sutra of the Sixth Patriarch Preserved in the Fu Ssu-nien Library, Academia Sinica”,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九本第一分,2008 年,第 163—185 页。

③王惠民:《西夏文草书〈瓜州审案记录〉叙录》,《敦煌学辑刊》2018 年第 2 期,第 152 页。

④罗福成:《〈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残本释文》,《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0 年第 4 卷第 3 号,第 227—235 页。

⑤武宇林认为,日本大谷探险队藏品,“有在吐鲁番搜集到的……西夏文不明论典、西夏文《六祖坛经》等等”(武宇林:《前言》,武宇林、[日]荒川慎太郎主编:《日本藏西夏文文献》,第 2 页),但未列证据。

⑥[日]野村荣三郎著,董炳月译:《蒙古新疆旅行日记》,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121、180 页。

⑦[日]西田龍雄:《西夏語と西夏文字》,《中央アジア古代語文獻》,西域文化研究會編,1961 年,第 451—456 页。最新研究参见孙伯君:《吐峪沟出土西夏文“大手印”法修持仪轨考释》,《西夏学》第 25 辑,甘肃文化出版社,2022 年,第 194—206 页。

到大谷光瑞“藏西夏国书残经四纸,字均草率”^①,则在三纸“不明论典”之外,当还有一纸《六祖坛经》。可知至晚在1914年,大谷光瑞已得到《六祖坛经》,他最有可能的机会应是橘瑞超的第三次探险。1912年初橘瑞超在敦煌多有所获,而且等待他的吉川小一郎已在此搜罗数月。考虑到草书本《六祖坛经》背面正是《瓜州审案记录》,那么在通常情况下,该文献的流传应不会太远。

然而,著名的莫高窟藏经洞(第17窟)中毫无西夏文痕迹^②,致使学界对源自敦煌一说比较审慎。实际上,敦煌的西夏文献十分丰富,1908年伯希和已在莫高窟北区发现诸多西夏文残片,此外在莫高窟南区、东千佛洞、碱泉子石窟等地均发现过西夏文文献,并且有草书写成的社会文书多件^③,故而无论是从时间和地点,还是文本内容而言,敦煌是最有可能的发现地。

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均由市场购入,国博所藏为1963年购进。北大所藏的3页为分别入藏,其中B21.006(622573[419.510.10a]v)号的藏品有北京邮购书店的信封,售价20元,时间应与国博所藏相去不远^④。傅斯年图书馆所藏应来自收购,史语所购进不少敦煌文献,夏鼐还曾致信询问是否购买西夏文刻经之事^⑤,显示出史语所

①罗福苕:《西夏国书略说》,东山学社,1914年,第22页。

②1923年8月到访敦煌的钟彤澧描述自己从“敦煌石室拾得西夏残字”的特点为“点画同楷字,独以繁复别”,可知应是西夏文书写;但他说“拾得元魏隋唐五代西夏写经残字,盖藏经洞初开时住持道人自洞中拾出弃置于此者”(转引自高田时雄:《钟彤澧其人及其著作》,《文献》2023年第6期,第229页),则与伯希和说藏经洞的“整批藏经中,没有任何一个西夏字”([法]保罗·伯希和:《敦煌藏经洞访书记》,[法]伯希和著,耿昇译:《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附录,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14页)明显不同。钟氏所说出于推测(“盖”),而伯希和是藏经洞文献最早的经眼者之一,故尚不足以颠覆传统认知。

③赵天英:《新见甘肃省瓜州县博物馆藏西夏文献考述》,《文献》2017年第3期,第32—42页。

④史金波:《北京大学、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藏卷综述》,《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2册,第345—346页。

⑤1945年3月26日夏鼐致傅斯年信,傅斯年图书馆藏(编号:李38-5-17)。图见 <http://lib.ihp.sinica.edu.tw/03-rare/dunhuang/01-4-6.htm> (访问日期:2023年11月10日)。

对收购西夏文文献的兴趣,可惜未留下收藏草书本《六祖坛经》的具体线索^①。除此之外,中国国家图书馆还藏有大批西夏文献,这些馆藏源自1929年以巨款收购的宁夏灵武1917年发现的两箱文献。不过,正如王惠民指出,参与整理的周叔迦等人,从未提及该件^②,故定非同批购入。更关键的是,从现有材料看,灵武所出除个别揭裱文献外,并无社会文书,而且其时代多晚至元明,这和《六祖坛经》背面为西夏早期的审案文书的情况大相径庭,所以应非灵武所出。此外,川上天山直言“夏译《六祖坛经》在内蒙古黑城(Khara-Khoto)出土”,却未有任何解释^③。而且黑水城经过俄、英、中瑞等多个考察队发掘,从未闻有发现草书本《六祖坛经》之事,川上天山此论应属臆测。

总之,这些流传到市场,从20世纪10年代到60年代分别为各机构购藏的草书本《六祖坛经》(背面为《瓜州审案记录》),并非来自吐鲁番、灵武和黑水城。考虑到敦煌文书在民国的流散较广,而且不少藏家均收藏有西夏文文献,敦煌是草书本《六祖坛经》最为可能的出土地。

二、西夏文草书写本《六祖坛经》版本考

西夏文草书本《六祖坛经》,率先由罗振玉之子罗福成释读,不过向来对新资料敏锐的罗家,却未注意到当时有关《六祖坛经》文献的新发现,仅用通行本作对勘,故谓“亦与藏本繁简不同,错乱颠倒”^④,给译释带来很大困扰。实际上,差异的根源并非来自翻译,而是汉文底本自身的巨大差别。数年后,日本学者川上天山便利用铃木大拙所校订的敦煌本《六祖坛经》进行比较,发现西夏文《六祖坛经》与敦煌本完全一致^⑤。后

^①参见[日]齋藤智寛:《“中央研究院”歴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敦煌文獻〉漢文部分鈔録補》,《敦煌寫本研究年報》2007年第1期,第27—52页。

^②王惠民:《西夏文草书〈瓜州审案记录〉叙录》,《敦煌学辑刊》2018年第2期,第152—157页。并参周叔迦编:《馆藏西夏文经典目录》,《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0年第4卷第3号,第259—330页。

^③[日]川上天山:《西夏語譯六祖壇經について》,《支那仏教史學》1938年第2卷第3号,第61—66页。

^④罗福成:《〈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残本释文》,《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0年第4卷第3号,第234页。

^⑤[日]川上天山:《西夏語譯六祖壇經について》,《支那仏教史學》1938年第2卷第3号,第61—66页。

来史金波、索罗宁等人的研究,更加证实西夏文草书本源于汉文敦煌本。

不过,随着各种汉文敦煌本《六祖坛经》陆续公布,有关版本谱系的研究越发深入,有必要将西夏文草书本在敦煌诸本中的定位进一步细化。汉文敦煌本《六祖坛经》,题为《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现存五种,其一为英国国家图书馆藏 S. 5475 号^①,册子本,首尾较完整(以下简称“英”);其二为敦煌市博物馆藏 077 号^②,册子本,首尾完整(以下简称“敦”);其三为旅顺博物馆藏本(以下简称“旅”),该本原为大谷探险队所得,卷尾有题款“显德五年乙未岁”(958)^③;其四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冈 48 号^④(BD04548,以下简称“北”),卷轴装,首尾残缺;其五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 79 号”残片(BD08958),由于该本残存的四行半与本文内容无关,故不作讨论。

周绍良指出敦煌诸本《六祖坛经》,“从整体而论,应该都是属于一个系统的本子,来源是一致的”^⑤,但是彼此间仍有细微差异,可以据此窥其流变。而西夏文草书本在与敦煌汉文本高度一致的情况下,亦有细微差异。本文以草书本,比较敦煌本诸本和惠昕本(以下简称“惠”),值得一提的是,草本的翻译十分严谨,为对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1) 𑖀𑖂𑖄𑖆𑖈𑖊𑖌𑖎𑖐𑖒𑖔𑖖𑖘𑖚𑖜𑖞𑖠𑖡𑖣𑖤𑖥𑖦𑖧𑖨𑖩𑖪𑖫𑖬𑖭𑖮𑖯𑖰𑖱𑖲𑖳𑖴𑖵𑖶𑖷𑖸𑖹𑖺𑖻𑖼𑖽𑖾𑗀𑖿𑗁𑗂𑗃𑗄𑗅𑗆𑗇𑗈𑗉𑗊𑗋𑗌𑗍𑗎𑗏𑗐𑗑𑗒𑗓𑗔𑗕𑗖𑗗𑗘𑗙𑗚𑗛𑗜𑗝𑗞𑗟𑗠𑗡𑗢𑗣𑗤𑗥𑗦𑗧𑗨𑗩𑗪𑗫𑗬𑗭𑗮𑗯𑗰𑗱𑗲𑗳𑗴𑗵𑗶𑗷𑗸𑗹𑗺𑗻𑗼𑗽𑗾𑗿𑘀𑘁𑘂𑘃𑘄𑘅𑘆𑘇𑘈𑘉𑘊𑘋𑘌𑘍𑘎𑘏𑘐𑘑𑘒𑘓𑘔𑘕𑘖𑘗𑘘𑘙𑘚𑘛𑘜𑘝𑘞𑘟𑘠𑘡𑘢𑘣𑘤𑘥𑘦𑘧𑘨𑘩𑘪𑘫𑘬𑘭𑘮𑘯𑘰𑘱𑘲𑘳𑘴𑘵𑘶𑘷𑘸𑘹𑘺𑘻𑘼𑘽𑘾𑘿𑙀𑙁𑙂𑙃𑙄𑙅𑙆𑙇𑙈𑙉𑙊𑙋𑙌𑙍𑙎𑙏𑙐𑙑𑙒𑙓𑙔𑙕𑙖𑙗𑙘𑙙𑙚𑙛𑙜𑙝𑙞𑙟𑙠𑙡𑙢𑙣𑙤𑙥𑙦𑙧𑙨𑙩𑙪𑙫𑙬𑙭𑙮𑙯𑙰𑙱𑙲𑙳𑙴𑙵𑙶𑙷𑙸𑙹𑙺𑙻𑙼𑙽𑙾𑙿𑚀𑚁𑚂𑚃𑚄𑚅𑚆𑚇𑚈𑚉𑚊𑚋𑚌𑚍𑚎𑚏𑚐𑚑𑚒𑚓𑚔𑚕𑚖𑚗𑚘𑚙𑚚𑚛𑚜𑚝𑚞𑚟𑚠𑚡𑚢𑚣𑚤𑚥𑚦𑚧𑚨𑚩𑚪𑚫𑚬𑚭𑚮𑚯𑚰𑚱𑚲𑚳𑚴𑚵𑚷𑚶𑚸𑚹𑚺𑚻𑚼𑚽𑚾𑚿𑛀𑛁𑛂𑛃𑛄𑛅𑛆𑛇𑛈𑛉𑛊𑛋𑛌𑛍𑛎𑛏𑛐𑛑𑛒𑛓𑛔𑛕𑛖𑛗𑛘𑛙𑛚𑛛𑛜𑛝𑛞𑛟𑛠𑛡𑛢𑛣𑛤𑛥𑛦𑛧𑛨𑛩𑛪𑛫𑛬𑛭𑛮𑛯𑛰𑛱𑛲𑛳𑛴𑛵𑛶𑛷𑛸𑛹𑛺𑛻𑛼𑛽𑛾𑛿𑜀𑜁𑜂𑜃𑜄𑜅𑜆𑜇𑜈𑜉𑜊𑜋𑜌𑜍𑜎𑜏𑜐𑜑𑜒𑜓𑜔𑜕𑜖𑜗𑜘𑜙𑜚𑜛𑜜𑜝𑜞𑜟𑜠𑜡𑜢𑜣𑜤𑜥𑜦𑜧𑜨𑜩𑜪𑜫𑜬𑜭𑜮𑜯𑜰𑜱𑜲𑜳𑜴𑜵𑜶𑜷𑜸𑜹𑜺𑜻𑜼𑜽𑜾𑜿𑝀𑝁𑝂𑝃𑝄𑝅𑝆𑝇𑝈𑝉𑝊𑝋𑝌𑝍𑝎𑝏𑝐𑝑𑝒𑝓𑝔𑝕𑝖𑝗𑝘𑝙𑝚𑝛𑝜𑝝𑝞𑝟𑝠𑝡𑝢𑝣𑝤𑝥𑝦𑝧𑝨𑝩𑝪𑝫𑝬𑝭𑝮𑝯𑝰𑝱𑝲𑝳𑝴𑝵𑝶𑝷𑝸𑝹𑝺𑝻𑝼𑝽𑝾𑝿𑞀𑞁𑞂𑞃𑞄𑞅𑞆𑞇𑞈𑞉𑞊𑞋𑞌𑞍𑞎𑞏𑞐𑞑𑞒𑞓𑞔𑞕𑞖𑞗𑞘𑞙𑞚𑞛𑞜𑞝𑞞𑞟𑞠𑞡𑞢𑞣𑞤𑞥𑞦𑞧𑞨𑞩𑞪𑞫𑞬𑞭𑞮𑞯𑞰𑞱𑞲𑞳𑞴𑞵𑞶𑞷𑞸𑞹𑞺𑞻𑞼𑞽𑞾𑞿𑟀𑟁𑟂𑟃𑟄𑟅𑟆𑟇𑟈𑟉𑟊𑟋𑟌𑟍𑟎𑟏𑟐𑟑𑟒𑟓𑟔𑟕𑟖𑟗𑟘𑟙𑟚𑟛𑟜𑟝𑟞𑟟𑟠𑟡𑟢𑟣𑟤𑟥𑟦𑟧𑟨𑟩𑟪𑟫𑟬𑟭𑟮𑟯𑟰𑟱𑟲𑟳𑟴𑟵𑟶𑟷𑟸𑟹𑟺𑟻𑟼𑟽𑟾𑟿𑠀𑠁𑠂𑠃𑠄𑠅𑠆𑠇𑠈𑠉𑠊𑠋𑠌𑠍𑠎𑠏𑠐𑠑𑠒𑠓𑠔𑠕𑠖𑠗𑠘𑠙𑠚𑠛𑠜𑠝𑠞𑠟𑠠𑠡𑠢𑠣𑠤𑠥𑠦𑠧𑠨𑠩𑠪𑠫𑠬𑠭𑠮𑠯𑠰𑠱𑠲𑠳𑠴𑠵𑠶𑠷𑠸𑠺𑠹𑠻𑠼𑠽𑠾𑠿𑡀𑡁𑡂𑡃𑡄𑡅𑡆𑡇𑡈𑡉𑡊𑡋𑡌𑡍𑡎𑡏𑡐𑡑𑡒𑡓𑡔𑡕𑡖𑡗𑡘𑡙𑡚𑡛𑡜𑡝𑡞𑡟𑡠𑡡𑡢𑡣𑡤𑡥𑡦𑡧𑡨𑡩𑡪𑡫𑡬𑡭𑡮𑡯𑡰𑡱𑡲𑡳𑡴𑡵𑡶𑡷𑡸𑡹𑡺𑡻𑡼𑡽𑡾𑡿𑢀𑢁𑢂𑢃𑢄𑢅𑢆𑢇𑢈𑢉𑢊𑢋𑢌𑢍𑢎𑢏𑢐𑢑𑢒𑢓𑢔𑢕𑢖𑢗𑢘𑢙𑢚𑢛𑢜𑢝𑢞𑢟𑢠𑢡𑢢𑢣𑢤𑢥𑢦𑢧𑢨𑢩𑢪𑢫𑢬𑢭𑢮𑢯𑢰𑢱𑢲𑢳𑢴𑢵𑢶𑢷𑢸𑢹𑢺𑢻𑢼𑢽𑢾𑢿𑣀𑣁𑣂𑣃𑣄𑣅𑣆𑣇𑣈𑣉𑣊𑣋𑣌𑣍𑣎𑣏𑣐𑣑𑣒𑣓𑣔𑣕𑣖𑣗𑣘𑣙𑣚𑣛𑣜𑣝𑣞𑣟𑣠𑣡𑣢𑣣𑣤𑣥𑣦𑣧𑣨𑣩𑣪𑣫𑣬𑣭𑣮𑣯𑣰𑣱𑣲𑣳𑣴𑣵𑣶𑣷𑣸𑣹𑣺𑣻𑣼𑣽𑣾𑣿𑤀𑤁𑤂𑤃𑤄𑤅𑤆𑤇𑤈𑤉𑤊𑤋𑤌𑤍𑤎𑤏𑤐𑤑𑤒𑤓𑤔𑤕𑤖𑤗𑤘𑤙𑤚𑤛𑤜𑤝𑤞𑤟𑤠𑤡𑤢𑤣𑤤𑤥𑤦𑤧𑤨𑤩𑤪𑤫𑤬𑤭𑤮𑤯𑤰𑤱𑤲𑤳𑤴𑤵𑤶𑤷𑤸𑤹𑤺𑤻𑤼𑤽𑤾𑤿𑥀𑥁𑥂𑥃𑥄𑥅𑥆𑥇𑥈𑥉𑥊𑥋𑥌𑥍𑥎𑥏𑥐𑥑𑥒𑥓𑥔𑥕𑥖𑥗𑥘𑥙𑥚𑥛𑥜𑥝𑥞𑥟𑥠𑥡𑥢𑥣𑥤𑥥𑥦𑥧𑥨𑥩𑥪𑥫𑥬𑥭𑥮𑥯𑥰𑥱𑥲𑥳𑥴𑥵𑥶𑥷𑥸𑥹𑥺𑥻𑥼𑥽𑥾𑥿𑦀𑦁𑦂𑦃𑦄𑦅𑦆𑦇𑦈𑦉𑦊𑦋𑦌𑦍𑦎𑦏𑦐𑦑𑦒𑦓𑦔𑦕𑦖𑦗𑦘𑦙𑦚𑦛𑦜𑦝𑦞𑦟𑦠𑦡𑦢𑦣𑦤𑦥𑦦𑦧𑦨𑦩𑦪𑦫𑦬𑦭𑦮𑦯𑦰𑦱𑦲𑦳𑦴𑦵𑦶𑦷𑦸𑦹𑦺𑦻𑦼𑦽𑦾𑦿𑧀𑧁𑧂𑧃𑧄𑧅𑧆𑧇𑧈𑧉𑧊𑧋𑧌𑧍𑧎𑧏𑧐𑧑𑧒𑧓𑧔𑧕𑧖𑧗𑧘𑧙𑧚𑧛𑧜𑧝𑧞𑧟𑧠𑧡𑧢𑧣𑧤𑧥𑧦𑧧𑧨𑧩𑧪𑧫𑧬𑧭𑧮𑧯𑧰𑧱𑧲𑧳𑧴𑧵𑧶𑧷𑧸𑧹𑧺𑧻𑧼𑧽𑧾𑧿𑨀𑨁𑨂𑨃𑨄𑨅𑨆𑨇𑨈𑨉𑨊𑨋𑨌𑨍𑨎𑨏𑨐𑨑𑨒𑨓𑨔𑨕𑨖𑨗𑨘𑨙𑨚𑨛𑨜𑨝𑨞𑨟𑨠𑨡𑨢𑨣𑨤𑨥𑨦𑨧𑨨𑨩𑨪𑨫𑨬𑨭𑨮𑨯𑨰𑨱𑨲𑨳𑨴𑨵𑨶𑨷𑨸𑨹𑨺𑨻𑨼𑨽𑨾𑨿𑩀𑩁𑩂𑩃𑩄𑩅𑩆𑩇𑩈𑩉𑩊𑩋𑩌𑩍𑩎𑩏𑩐𑩑𑩒𑩓𑩔𑩕𑩖𑩗𑩘𑩙𑩚𑩛𑩜𑩝𑩞𑩟𑩠𑩡𑩢𑩣𑩤𑩥𑩦𑩧𑩨𑩩𑩪𑩫𑩬𑩭𑩮𑩯𑩰𑩱𑩲𑩳𑩴𑩵𑩶𑩷𑩸𑩹𑩺𑩻𑩼𑩽𑩾𑩿𑪀𑪁𑪂𑪃𑪄𑪅𑪆𑪇𑪈𑪉𑪊𑪋𑪌𑪍𑪎𑪏𑪐𑪑𑪒𑪓𑪔𑪕𑪖𑪗𑪘𑪙𑪚𑪛𑪜𑪝𑪞𑪟𑪠𑪡𑪢𑪣𑪤𑪥𑪦𑪧𑪨𑪩𑪪𑪫𑪬𑪭𑪮𑪯𑪰𑪱𑪲𑪳𑪴𑪵𑪶𑪷𑪸𑪹𑪺𑪻𑪼𑪽𑪾𑪿𑫀𑫁𑫂𑫃𑫄𑫅𑫆𑫇𑫈𑫉𑫊𑫋𑫌𑫍𑫎𑫏𑫐𑫑𑫒𑫓𑫔𑫕𑫖𑫗𑫘𑫙𑫚𑫛𑫜𑫝𑫞𑫟𑫠𑫡𑫢𑫣𑫤𑫥𑫦𑫧𑫨𑫩𑫪𑫫𑫬𑫭𑫮𑫯𑫰𑫱𑫲𑫳𑫴𑫵𑫶𑫷𑫸𑫹𑫺𑫻𑫼𑫽𑫾𑫿𑬀𑬁𑬂𑬃𑬄𑬅𑬆𑬇𑬈𑬉𑬊𑬋𑬌𑬍𑬎𑬏𑬐𑬑𑬒𑬓𑬔𑬕𑬖𑬗𑬘𑬙𑬚𑬛𑬜𑬝𑬞𑬟𑬠𑬡𑬢𑬣𑬤𑬥𑬦𑬧𑬨𑬩𑬪𑬫𑬬𑬭𑬮𑬯𑬰𑬱𑬲𑬳𑬴𑬵𑬶𑬷𑬸𑬹𑬺𑬻𑬼𑬽𑬾𑬿𑭀𑭁𑭂𑭃𑭄𑭅𑭆𑭇𑭈𑭉𑭊𑭋𑭌𑭍𑭎𑭏𑭐𑭑𑭒𑭓𑭔𑭕𑭖𑭗𑭘𑭙𑭚𑭛𑭜𑭝𑭞𑭟𑭠𑭡𑭢𑭣𑭤𑭥𑭦𑭧𑭨𑭩𑭪𑭫𑭬𑭭𑭮𑭯𑭰𑭱𑭲𑭳𑭴𑭵𑭶𑭷𑭸𑭹𑭺𑭻𑭼𑭽𑭾𑭿𑮀𑮁𑮂𑮃𑮄𑮅𑮆𑮇𑮈𑮉𑮊𑮋𑮌𑮍𑮎𑮏𑮐𑮑𑮒𑮓𑮔𑮕𑮖𑮗𑮘𑮙𑮚𑮛𑮜𑮝𑮞𑮟𑮠𑮡𑮢𑮣𑮤𑮥𑮦𑮧𑮨𑮩𑮪𑮫𑮬𑮭𑮮𑮯𑮰𑮱𑮲𑮳𑮴𑮵𑮶𑮷𑮸𑮹𑮺𑮻𑮼𑮽𑮾𑮿𑯀𑯁𑯂𑯃𑯄𑯅𑯆𑯇𑯈𑯉𑯊𑯋𑯌𑯍𑯎𑯏𑯐𑯑𑯒𑯓𑯔𑯕𑯖𑯗𑯘𑯙𑯚𑯛𑯜𑯝𑯞𑯟𑯠𑯡𑯢𑯣𑯤𑯥𑯦𑯧𑯨𑯩𑯪𑯫𑯬𑯭𑯮𑯯𑯰𑯱𑯲𑯳𑯴𑯵𑯶𑯷𑯸𑯹𑯺𑯻𑯼𑯽𑯾𑯿𑰀𑰁𑰂𑰃𑰄𑰅𑰆𑰇𑰈𑰉𑰊𑰋𑰌𑰍𑰎𑰏𑰐𑰑𑰒𑰓𑰔𑰕𑰖𑰗𑰘𑰙𑰚𑰛𑰜𑰝𑰞𑰟𑰠𑰡𑰢𑰣𑰤𑰥𑰦𑰧𑰨𑰩𑰪𑰫𑰬𑰭𑰮𑰯𑰰𑰱𑰲𑰳𑰴𑰵𑰶𑰷𑰸𑰹𑰺𑰻𑰼𑰽𑰾𑰿𑱀𑱁𑱂𑱃𑱄𑱅𑱆𑱇𑱈𑱉𑱊𑱋𑱌𑱍𑱎𑱏𑱐𑱑𑱒𑱓𑱔𑱕𑱖𑱗𑱘𑱙𑱚𑱛𑱜𑱝𑱞𑱟𑱠𑱡𑱢𑱣𑱤𑱥𑱦𑱧𑱨𑱩𑱪𑱫𑱬𑱭𑱮𑱯𑱰𑱱𑱲𑱳𑱴𑱵𑱶𑱷𑱸𑱹𑱺𑱻𑱼𑱽𑱾𑱿𑲀𑲁𑲂𑲃𑲄𑲅𑲆𑲇𑲈𑲉𑲊𑲋𑲌𑲍𑲎𑲏𑲐𑲑𑲒𑲓𑲔𑲕𑲖𑲗𑲘𑲙𑲚𑲛𑲜𑲝𑲞𑲟𑲠𑲡𑲢𑲣𑲤𑲥𑲦𑲧𑲨𑲩𑲪𑲫𑲬𑲭𑲮𑲯𑲰𑲱𑲲𑲳𑲴𑲵𑲶𑲷𑲸𑲹𑲺𑲻𑲼𑲽𑲾𑲿𑳀𑳁𑳂𑳃𑳄𑳅𑳆𑳇𑳈𑳉𑳊𑳋𑳌𑳍𑳎𑳏𑳐𑳑𑳒𑳓𑳔𑳕𑳖𑳗𑳘𑳙𑳚𑳛𑳜𑳝𑳞𑳟𑳠𑳡𑳢𑳣𑳤𑳥𑳦𑳧𑳨𑳩𑳪𑳫𑳬𑳭𑳮𑳯𑳰𑳱𑳲𑳳𑳴𑳵𑳶𑳷𑳸𑳹𑳺𑳻𑳼𑳽𑳾𑳿𑴀𑴁𑴂𑴃𑴄𑴅𑴆𑴇𑴈𑴉𑴊𑴋𑴌𑴍𑴎𑴏𑴐𑴑𑴒𑴓𑴔𑴕𑴖𑴗𑴘𑴙𑴚𑴛𑴜𑴝𑴞𑴟𑴠𑴡𑴢𑴣𑴤𑴥𑴦𑴧𑴨𑴩𑴪𑴫𑴬𑴭𑴮𑴯𑴰𑴱𑴲𑴳𑴴𑴵𑴶𑴷𑴸𑴹𑴺𑴻𑴼𑴽𑴾𑴿𑵀𑵁𑵂𑵃𑵄𑵅𑵆𑵇𑵈𑵉𑵊𑵋𑵌𑵍𑵎𑵏𑵐𑵑𑵒𑵓𑵔𑵕𑵖𑵗𑵘𑵙𑵚𑵛𑵜𑵝𑵞𑵟𑵠𑵡𑵢𑵣𑵤𑵥𑵦𑵧𑵨𑵩𑵪𑵫𑵬𑵭𑵮𑵯𑵰𑵱𑵲𑵳𑵴𑵵𑵶𑵷𑵸𑵹𑵺𑵻𑵼𑵽𑵾𑵿𑶀𑶁𑶂𑶃𑶄𑶅𑶆𑶇𑶈𑶉𑶊𑶋𑶌𑶍𑶎𑶏𑶐𑶑𑶒𑶓𑶔𑶕𑶖𑶗𑶘𑶙𑶚𑶛𑶜𑶝𑶞𑶟𑶠𑶡𑶢𑶣𑶤𑶥𑶦𑶧𑶨𑶩𑶪𑶫𑶬𑶭𑶮𑶯𑶰𑶱𑶲𑶳𑶴𑶵𑶶𑶷𑶸𑶹𑶺𑶻𑶼𑶽𑶾𑶿𑷀𑷁𑷂𑷃𑷄𑷅𑷆𑷇𑷈𑷉𑷊𑷋𑷌𑷍𑷎𑷏𑷐𑷑𑷒𑷓𑷔𑷕𑷖𑷗𑷘𑷙𑷚𑷛𑷜𑷝𑷞𑷟𑷠𑷡𑷢𑷣𑷤𑷥𑷦𑷧𑷨𑷩𑷪𑷫𑷬𑷭𑷮𑷯𑷰𑷱𑷲𑷳𑷴𑷵𑷶𑷷𑷸𑷹𑷺𑷻𑷼𑷽𑷾𑷿𑸀𑸁𑸂𑸃𑸄𑸅𑸆𑸇𑸈𑸉𑸊𑸋𑸌𑸍𑸎𑸏𑸐𑸑𑸒𑸓𑸔𑸕𑸖𑸗𑸘𑸙𑸚𑸛𑸜𑸝𑸞𑸟𑸠𑸡𑸢𑸣𑸤𑸥𑸦𑸧𑸨𑸩𑸪𑸫𑸬𑸭𑸮𑸯𑸰𑸱𑸲𑸳𑸴𑸵𑸶𑸷𑸸𑸹𑸺𑸻𑸼𑸽𑸾𑸿𑹀𑹁𑹂𑹃𑹄𑹅𑹆𑹇𑹈𑹉𑹊𑹋𑹌𑹍𑹎𑹏𑹐𑹑𑹒𑹓𑹔𑹕𑹖𑹗𑹘𑹙𑹚𑹛𑹜𑹝𑹞𑹟𑹠𑹡𑹢𑹣𑹤𑹥𑹦𑹧𑹨𑹩𑹪𑹫𑹬𑹭𑹮𑹯𑹰𑹱𑹲𑹳𑹴𑹵𑹶𑹷𑹸𑹹𑹺𑹻𑹼𑹽𑹾𑹿𑺀𑺁𑺂𑺃𑺄𑺅𑺆𑺇𑺈𑺉𑺊𑺋𑺌𑺍𑺎𑺏𑺐𑺑𑺒𑺓𑺔𑺕𑺖𑺗𑺘𑺙𑺚𑺛𑺜𑺝𑺞𑺟𑺠𑺡𑺢𑺣𑺤𑺥𑺦𑺧𑺨𑺩𑺪𑺫𑺬𑺭𑺮𑺯𑺰𑺱𑺲𑺳𑺴𑺵𑺶𑺷𑺸𑺹𑺺𑺻𑺼𑺽𑺾𑺿𑻀𑻁𑻂𑻃𑻄𑻅𑻆𑻇𑻈𑻉𑻊𑻋𑻌𑻍𑻎𑻏𑻐𑻑𑻒𑻓𑻔𑻕𑻖𑻗𑻘𑻙𑻚𑻛𑻜𑻝𑻞𑻟𑻠𑻡𑻢𑻣𑻤𑻥𑻦𑻧𑻨𑻩𑻪𑻫𑻬𑻭𑻮𑻯𑻰𑻱𑻲𑻳𑻴𑻵𑻶𑻷𑻸𑻹𑻺𑻻𑻼𑻽𑻾𑻿𑼀𑼁𑼂𑼃𑼄𑼅𑼆𑼇𑼈𑼉𑼊𑼋𑼌𑼍𑼎𑼏𑼐𑼑𑼒𑼓𑼔𑼕𑼖𑼗𑼘𑼙𑼚𑼛𑼜𑼝𑼞𑼟𑼠𑼡𑼢𑼣𑼤𑼥𑼦𑼧𑼨𑼩𑼪𑼫𑼬𑼭𑼮𑼯𑼰𑼱𑼲𑼳𑼴𑼵𑼶𑼷𑼸𑼹𑼺𑼻𑼼𑼽𑼾𑼿𑽀𑽁𑽂𑽃𑽄𑽅𑽆𑽇𑽈𑽉𑽊𑽋𑽌𑽍𑽎𑽏𑽐𑽑𑽒𑽓𑽔𑽕𑽖𑽗𑽘𑽙𑽚𑽛𑽜𑽝𑽞𑽟𑽠𑽡𑽢𑽣𑽤𑽥𑽦𑽧𑽨𑽩𑽪𑽫𑽬𑽭𑽮𑽯𑽰𑽱𑽲𑽳𑽴𑽵𑽶𑽷𑽸𑽹𑽺𑽻𑽼𑽽𑽾𑽿𑾀𑾁𑾂𑾃𑾄𑾅𑾆𑾇𑾈𑾉𑾊𑾋𑾌𑾍𑾎𑾏𑾐𑾑𑾒𑾓𑾔𑾕𑾖𑾗𑾘𑾙𑾚𑾛𑾜𑾝𑾞𑾟𑾠𑾡𑾢𑾣𑾤𑾥𑾦𑾧𑾨𑾩𑾪𑾫𑾬𑾭𑾮𑾯𑾰𑾱𑾲𑾳𑾴𑾵𑾶𑾷𑾸𑾹𑾺𑾻𑾼𑾽𑾾𑾿𑿀𑿁𑿂𑿃𑿄𑿅𑿆𑿇𑿈𑿉𑿊𑿋𑿌𑿍𑿎𑿏𑿐𑿑𑿒𑿓𑿔𑿕𑿖𑿗𑿘𑿙𑿚𑿛𑿜𑿝𑿞𑿟𑿠𑿡𑿢𑿣𑿤𑿥𑿦𑿧𑿨𑿩𑿪𑿫𑿬𑿭𑿮𑿯𑿰𑿱𑿲𑿳𑿴𑿵𑿶𑿷𑿸𑿹𑿺𑿻𑿼𑿽𑿾𑿿𑀀𑀁𑀂𑀃𑀄𑀅𑀆𑀇𑀈𑀉𑀊𑀋𑀌𑀍𑀎𑀏𑀐𑀑𑀒𑀓𑀔𑀕𑀖𑀗𑀘𑀙𑀚𑀛𑀜𑀝𑀞𑀟𑀠𑀡𑀢𑀣𑀤𑀥𑀦𑀧𑀨𑀩𑀪𑀫𑀬𑀭𑀮𑀯𑀰𑀱𑀲𑀳𑀴𑀵𑀶𑀷𑀸𑀹𑀺𑀻𑀼𑀽𑀾𑀿𑁀𑁁𑁂𑁃𑁄𑁅𑁆𑁇𑁈𑁉𑁊𑁋𑁌𑁍𑁎𑁏𑁐𑁑𑁒𑁓𑁔𑁕𑁖𑁗𑁘𑁙𑁚𑁛𑁜𑁝𑁞𑁟𑁠𑁡𑁢𑁣𑁤𑁥𑁦𑁧𑁨𑁩𑁪𑁫𑁬𑁭𑁮𑁯𑁰𑁱𑁲𑁳𑁴𑁵𑁶𑁷𑁸𑁹𑁺𑁻𑁼𑁽𑁾𑁿𑂀𑂁𑂂𑂃𑂄𑂅𑂆𑂇𑂈𑂉𑂊𑂋𑂌𑂍𑂎𑂏𑂐𑂑𑂒𑂓𑂔𑂕𑂖𑂗𑂘𑂙𑂚𑂛𑂜𑂝𑂞𑂟𑂠𑂡𑂢𑂣𑂤𑂥𑂦𑂧𑂨𑂩𑂪𑂫𑂬𑂭𑂮𑂯𑂰𑂱𑂲𑂳𑂴𑂵𑂶𑂷𑂸𑂺𑂹𑂻𑂼𑂽𑂾𑂿𑃀𑃁𑃂𑃃𑃄𑃅𑃆𑃇𑃈𑃉𑃊𑃋𑃌𑃍𑃎𑃏𑃐𑃑𑃒𑃓𑃔𑃕𑃖𑃗𑃘𑃙𑃚𑃛𑃜𑃝𑃞𑃟𑃠𑃡𑃢𑃣𑃤𑃥𑃦𑃧𑃨𑃩𑃪𑃫𑃬𑃭𑃮𑃯𑃰𑃱𑃲𑃳𑃴𑃵𑃶𑃷𑃸𑃹𑃺𑃻𑃼𑃽𑃾𑃿𑄀𑄁𑄂𑄃𑄄𑄅𑄆𑄇𑄈𑄉𑄊𑄋𑄌𑄍𑄎𑄏𑄐𑄑𑄒𑄓𑄔𑄕𑄖𑄗𑄘𑄙𑄚𑄛𑄜𑄝𑄞𑄟𑄠𑄡𑄢𑄣𑄤𑄥

旅：解意离生灭。若著境生灭起。

英：解意离生灭，著竟生灭去。

敦：解意离生灭，著境生灭起。

北：解意离生灭，著境生灭起。

惠：解义离生灭，著境生灭起。

(3) 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

草书本汉译：一切所在时中，念念不愚。

旅：一时中，念念不愚。

英：一时中，念念不愚。

敦：一时中，念念不思。

北：一时中，念念不思。

惠：一切处所、一切时中，念念不愚。

(4) 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

草书本汉译：若心中常愚，言“我修般若”者，般若无形相。

旅：心中常愚，我修般若，般(若)无形相。

英：心中常愚，我修般若，无形相。

敦：心常愚，我修般若，无形相。

北：心常愚，我修般若，无形相。

惠：心中常愚，自言我修般若，念念说空，不识真空，般若无形相。

(5) 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

草书本汉译：自性含万法中者是大。

旅：性含万法是大。

英：性舍万法是大。

敦：性舍万法是大。

北：性舍万法是大。

惠：自性能含万法是大。

(6) 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①，𠄎𠄎𠄎𠄎𠄎。

草书本汉译：邪来正度，迷来悟度，愚来智度，恶来善度。

旅：邪来正度，迷来悟度，愚来智度，恶来善度。

英：邪见正度，迷来悟度，愚来智度，恶来善度。

① 西夏文𠄎和𠄎都表示汉文“度”字。此处为何两字并用，笔者猜测有两种可能性：

一是此为西夏的一种构词法，二是原文衍字。具体原因尚不明确。

敦：迷来悟度，愚来智度，恶来善度。

北：迷来悟度，愚来智度，恶来善度。

惠：邪来正度，迷来悟度，愚来智度，恶来善度。

(7) 𦉑𦉑𦉑𦉑𦉑𦉑𦉑𦉑，𦉑𦉑𦉑𦉑𦉑𦉑𦉑𦉑，𦉑𦉑𦉑𦉑𦉑𦉑𦉑𦉑。

草书本汉译：心地无非自性戒也，心地无痴自性慧也。心地无乱自性定也。

旅：心地无非自性戒，心地无乱是自性定，心地无痴自性是惠。

英：心地无疑非自性戒，心地无乱是自性定，心地无痴自性是惠。

敦：心地无疑非自性戒，心地无乱是自性定，心地无痴是自性惠。

北：(阙)

惠：心地无非自性戒，心地无痴自性惠，心地无乱自性定。

(8) 𦉑𦉑𦉑𦉑𦉑𦉑𦉑𦉑，𦉑𦉑𦉑𦉑𦉑𦉑𦉑𦉑。

草书本汉译：若欲后来觅本身，三毒恶缘心重洗。

旅：若欲当来觅本身，三毒恶缘心重洗。

英：若欲当来觅本身，三毒恶缘心中洗。

敦：若欲当来觅自身，三毒恶缘心里洗。

北：(阙)

惠：若欲当来觅法身，离诸法相心中洗。

综上所述 8 例，可统计诸本与西夏文草书本的不同处如下：

1. 旅、英、敦、北本相同，但与草书本不同的共有 6 处^①。分别为第(2)例的“著心”、第(3)例的“一切所在”、第(4)例的“若”“言”、第(5)例的“自性”以及第(7)例“戒”“慧”“定”的顺序。

2. 英、敦、北本相同，但与草书本不同的有 2 处，分别为第(4)例的“般若无形相”以及第(5)例的“含”。

3. 英、敦本相同，但与草书本不同的有 1 处，为第(7)例草书本缺“无疑非”。

4. 敦、北本相同，但与草书本不同的有 3 处，分别为第(3)例的“愚”、第(4)例的“心中”以及第(6)例的“邪来正度”。

5. 敦本与草书本的不同共有 2 处，分别为第(1)例的“波罗蜜多”、第(8)例的“心重”。英本与草书本的不同有 4 处，分别为第(1)例的“番言”、第(2)例的“起”、第(6)例的“邪来”、第(8)例的“心重”。北本与草

^①以下比较，以草书本文字为准。

书本的不同之处有 1 例,为第(1)例的“波罗蜜多”。

敦煌诸本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排除与各本的共同差异,草书本与旅本最为一致,与英本距离最远。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差异有多处却与后世的惠昕本接近。这表明,惠昕本的变化实际上暗含在敦煌本的流变中。西夏文草书本应处于旅本这一阶段的敦煌本到惠昕本的过渡阶段。

三、西夏文楷书写本《六祖坛经》版本考

西夏文楷书本《六祖坛经》残页为斯坦因在黑水城所获,文志勇曾对此进行释读和缀合。不过文氏认为“可以确定它是依据最早的法海本《坛经》简写而成”^①。法海本即敦煌本,如其所言,该本便应是又一种敦煌本《六祖坛经》,那么其结论是否成立呢?在楷书本中,出现“𐽀𐽁𐽂𐽃, 𐽀𐽁𐽂𐽃𐽄𐽅𐽆𐽇𐽋𐽍𐽈𐽉𐽊𐽌”,可译为“第十一,对十和尚之教示、传法及灭度年月之说门”,显然为标题文字。敦煌本《六祖坛经》不分篇章,亦不分卷^②,这提示我们西夏文楷书本绝非敦煌本系统。《六祖坛经》的章节划分今存两种,惠昕自序“分为两卷,凡十一门”,共十一部分,契嵩本系统则划为十部分;惠昕本“第十一门”大概对应后者的“付嘱第十”。显然,西夏文楷书本应属于惠昕本系统。该系统自 20 世纪 30 年代起为学界所注意,迄今已在日本发现五种,分别为名古屋真福寺藏本(以下简称“真福本”)、京都兴圣寺藏本(以下简称“兴圣本”)、京都天宁寺藏本(以下简称“天宁本”)、大石川乘寺藏本(以下简称“大乘本”)和宽永刻本^③。对比可知,西夏文楷书本此章的标题和惠昕系统诸本高度一致,如下表 1 所示:

①文志勇:《英藏黑水城出土文献西夏文〈坛经〉释考》,《西夏研究》2021 年第 2 期,第 3 页。

②杨曾文校写:《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坛经》,第 201 页。

③本文用于比较的惠昕本来源为:兴圣本、天宁本、大乘本的影印本,参见[日]柳田圣山主编:《六祖坛经诸本集成》,京都中文出版社,1976 年,第 331—348、351—372、375—399 页。真福本,参见林崇安公布的原件照片,内观教育基金会,2018 年, <http://www.ss.ncu.edu.tw/~calin/altar/a-b1.pdf> (访问日期:2022 年 10 月 11 日)。宽永刻本与兴圣本极其接近,“可以被视为是同一个本子”(白光:《〈坛经〉版本谱系及其思想流变研究》,第 94 页),本文不做单独讨论。

表 1 第十一章标题对比

版本	第十一章标题
真福本	十一、教示十僧传法门 灭度年月附
兴圣本	十一、教示十僧传法门 灭度年月附
天宁本	十一、教示十僧传法 灭度年月附
大乘本	十一、教示十僧传法 灭度年月附 ^①
西夏文楷书本汉译	第十一、对十和尚之教示、传法及灭度年月之说门

除标题外,还可以从内容上进一步证明。考虑到西夏文楷书本的翻译较随意,为了避免移译的误差,仅举明显差别之处:

其一,志诚问法的结尾,惠昕本有“所以能立一切法”^②,而敦煌本均无,楷书本作“……禰禰禰禰(能立一切法)”;

其二,敦煌本“法即甚达,汝心不达,经上无痴”,惠昕本均作“法即甚达,汝心不达。经本无疑,汝心自疑”,痴(癡)、疑二字形近,不足以作为区分的标准,但是惠昕本多出“汝心自疑”一句,楷书本亦有“禰禰禰禰(汝心自疑)”;

其三,慧能与神会讨论“痛与不痛”的部分,敦煌本中“若不痛,即同无情木石”是神会的话,但在惠昕本中,此句为慧能对神会所讲。楷书本作“禰禰禰禰(汝若不痛,则同木石)”,与惠昕本同。

总之,从标题与内容两方面,都可证明西夏文楷书本属于惠昕本系统。

那么,西夏文楷书本在惠昕本系统的版本谱系中处于什么位置呢?日藏五种惠昕本,其中天宁本、大乘本属于存中 1116 年刻本系统,真福本属于周希古 1012 年刻本系统,兴圣本和宽永本属于晁子健 1153 年刻本系统。首先,存中刻本系统在章节标题中无“门”,这与西夏文楷书本不同,故可排除天宁本、大乘本。而且在慧能灭度前召唤弟子名录中,大乘本将“志诚、法达”作“志达”,他本无,西夏文楷书本亦无。天宁本在法达问法时,提到他“常诵《法华经》”,而西夏文楷书本、真福本、兴圣本,乃至敦煌本,均有“徂禰禰禰禰禰(读《莲华经》七年)”之语,因此西夏文楷书本并非存中系统(天宁本、大乘本)之本。

^①惠昕本在目录和正文中的章节标题不同,此处仅对比正文部分。

^②兴圣本作“所以不立一切法”,略有不同。

真福本和兴圣本(包括宽永本)较为接近^①,但仍有细微差别。上文所述惠昕系诸本的“所以能立一切法”,兴圣本“能立”作“不立”,此外还把《法华经》的“七卷”写作“十卷”,《法华经》历来仅有七卷本和八卷本,此处“十”应为形讹。两处均与包括西夏文楷书本在内的各种惠昕本不同。显然,西夏文楷书本与真福本(属于周希古刻本系统)更为接近。

四、结语

西夏文的两件《六祖坛经》译本,均属于《六祖坛经》早期版本。其中草书的来源并非原先认定的黑水城、吐鲁番、灵武等地,而很可能出自敦煌。该本属于敦煌本系统,但已有部分文字(和旅博本一样)接近惠昕本,处于过渡阶段,为梳理敦煌诸本的谱系提供了新证据,一些原认为是惠昕本发生的变化,实际在敦煌本早已出现。楷书本发现自黑水城,并非此前推测的敦煌本系统,而是日本之外仅见的惠昕本。具体而言,接近惠昕本中的周希古刻本和晁子健刻本系统,而非存中刻本系统。在存世的各惠昕本中,最接近真福本,其次为兴圣本、宽永本,而与天宁本、大乘本较远。《六祖坛经》的早期版本,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胡适本人直到晚年依然孜孜不倦地建议日本学者搜寻《六祖坛经》古本^②。由于西夏文《六祖坛经》散藏各地,且有语言隔膜,因此学界的关注有限。实际上,两件译本不仅为了解西夏的佛经传播与翻译事业提供了新线索,也对认识《六祖坛经》的版本流变具有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刘少华,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讲师。研究方向:西夏语言文字、西夏佛教。孙祎达,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献学和学术史。

①白光指出,真福本的版本谱系介于天宁本至宽永本(兴圣本)之间(白光:《〈坛经〉版本谱系及其思想流变研究》,第111页)。

②如1959年5月29日胡适致入矢义高函(潘光哲主编:《胡适全集·胡适中文书信集5》,胡适纪念馆,2018年,第76页)。